

壹、前言

在長久的西化歷史下，本土化一直是臺灣社會的一個核心議題，而此議題許久之前就在社會科學領域開始發酵，如早在 1972 年，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就出版了《中國人的性格》一書。1980 年 12 月更舉辦了一場「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中國化」學術研討會，第一次由學術界有系統地集體檢討西方理論和學術本土化這個議題（林秀珍，1999），後來並集結成冊，由楊國樞和文崇一主編，在 1982 年出版了《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一書。做為社會科學領域的一環，教育領域也對西化和本土化有很清楚的體認，例如，伍振鶯與陳伯璋（1985）就曾在〈我國近四十年來教育研究之初步檢討〉一文中回顧當時教育研究的問題，結語中他們語重心長地指出，我們的教育由於受到強勢西方文化的壟斷與控制，因此造就了教育研究的「移植性」、「實證性」、「實用性」與「加工性」，並使得國內教育研究無法進一步茁壯與發展。該文似乎也產生引領的效應，周愚文（1987）便以該文為前提，提出以教育研究「本土化」做為研究新方向的構想。後來「本土化」這個議題便一直出現在許多教育論文中，如吳清山（1993）與黃政傑（1995）。然而，將近三十年後的臺灣，教育西方化和本土化的問題卻依舊存在，我們仍然處在一種歐美生產、臺灣消費的模式中（周梅雀，2002；侯元鈞，2005）。而陳沛嵐（2004）在回顧近二十年來臺灣課程研究本土化問題時也發現，研究者大多是直接將國外的理論不假思索地運用在其研究，頂多再「打上一些本土的迷霧」或是「外來與本土的剪輯與拼湊」，很難發現有臺灣課程的「原音」。又如早在二十多年前，周愚文（1987: 128）就曾說：

當國外人本心理學成為第三勢力，我們就跟著研究羅吉斯、馬斯洛；國外解釋學、批判理論風靡一時，我們就開始談高達美、哈伯瑪斯……。

然而放眼今日，教育學術界仍然是將這些西方理論擺在首要地位，唯一不同的是，多了更多的國外理論，如後現代主義、建構主義或再概念化學派。這種狀況不免讓人意識到，究竟發生了什麼問題？為什麼西化和本土化的研究問題進展

如此緩慢？而未來又將朝何種方向努力呢？本文基於這樣的問題意識，透過對先前教育本土化的論述與研究進行回顧與省思，並結合近來相關的研究成果，指出一些臺灣本土化研究的困境與可能性。

不過，由於之前研究者使用的概念通常沒有一致的界定，因此本文所涉及的概念與名詞似乎有需要先做進一步的釐清，特別是「教育的本土化研究」、「教育研究本土化」及「教育實踐本土化」三者。第一，「教育的本土化研究」應是指涉及「本土化」議題的相關教育研究，涵蓋理論與實徵的各類議題，涵蓋範圍在三者之中最廣。研究者可根據某種理論或實徵方法，來探討任何關於「本土化」的教育議題，例如，可以從後殖民理論來探討教育本土化的政策、課程或教學，也可以基於某種「本土化」的概念或理論，實際地探索特定議題，例如，「學校文化」的本土化研究。第二，「教育研究本土化」應是「教育本土化研究」中的一類，但較屬於「後設性」的研究，討論的是怎樣的「教育研究」才算是本土化的研究？它可能被定義和詮釋的方式為何？它可能涉及的議題為何？它又如何才能被本土化？它如何被分類？而又具備哪些特徵？等問題。這樣的研究通常涉及理論與概念的抽象議題，但其好處是可以引發更多的討論及更多的教育本土化研究和實踐可能性。第三，「教育實踐本土化」則是屬於「實踐性」的面向，主要是根據上述兩種本土化的研究（「教育的本土化研究」和「教育研究本土化」），將這些研究成果運用於實際的行動當中，藉以改善過去沒有反省就直接將西方理論帶入現場所造成的問題。其中，特別是「實徵性」的教育的本土化研究，由於這些研究相較於「理論概念」的研究更為具體，故其對實踐行動的啓示可能更為直接。當然實踐的過程也可以回饋給研究者新的反思，做為重新修正理論和概念的基礎。由這樣的角度看來，「教育的本土化研究」、「教育研究本土化」及「教育實踐本土化」是彼此相關、涵蓋及相互影響的，三者無法完全切割。

而本文基本上是屬於「教育研究本土化」的研究，偏屬後設研究，希望藉由反省過去教育本土化研究中的一些問題，提出未來進行教育研究本土化的可能方向和建議。本文將會提出一些可能的重要議題（例如東西認識論、東西本體論、升學主義、新自由主義等）和一個初步的理論架構。此外，除了理論架構的探討外，本文也會探討「理論」如何才能與「實踐」結合的問題，主要是為了呼應後